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四九期 ——
(二〇〇七年一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1c)

【恐怖岁月】孤魂无处话凄凉“吊劳改犯事件”——广州文革一大悬案	阿 陀
【亡灵祭坛】血写的历史——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	赵 旭
【当事者说】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林 莽
【往事如烟】教育部红卫兵——文革点滴记忆	姜和平
【痛定思痛】四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提纲)	任彦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恐怖岁月】

孤魂无处话凄凉
“吊劳改犯事件”——广州文革一大悬案

• 阿 陀 •

◇ 流言如火：“劳改犯将血洗广州！”

一九六七年八月，文革高潮中的广州。

街头小报是这样描写的：

“……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注一）。

广东省军管会当年的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八月六日，广州市各公安局派出所遭到抢枪的群众组织41次冲击。

八月七日，广州海珠区，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和郊区的公安局派出所处在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有的被关押犯人因为无人看管，已自行出走。

八月八日，郊区茶头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已跑了四百多人，还在继续跑。

八月十日，槎头收容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拒收83名偷渡人。由此，“释放劳改犯”谣言不胫而走……

八月十一日，一位自称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打电话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慌……”（注二）

一位当年群众组织的头头回忆说：

“大约就是八月十号，我们占驻海珠广场广交会陈列馆的“红联”总部突然接到省航运厅军代表的电话紧急通告：有几千劳改犯正乘坐“花尾岛”（船）从北江往广州开来……”（注三）

“劳改犯即将血洗广州”！——流言像野火一样迅速在广州城的大街小巷蔓延，烧烤着惊慌失措的市民紧张得已经快要崩裂的神经。自古有云：“小乱入城，大乱下乡”，一些家庭开始设法把老人孩子疏散到乡下或外地去。各单位和居民点都紧急安排值班守夜，联防自保……

◇ 闹巷自保，“街道联防”应急生

据老街坊说，早在清末民初，因为政制更迭，社会动荡，广州市民就有闹街筑垒，联防自保的传统。文革中广州武斗规模远不如全国其他许多城市，可是居民自发闹街巷，割据搞起“街道联防”，却是独一无二的。当年香港出了一本关于广州文革的书，其中提到：

“街道联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随着街道联防的迫切需要，街道联防的形式愈见严密。后来，各街道之间，都设有闹栅，这些闹栅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一般都很坚固。材料的来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取用。当时广州的一般街道，普遍设有这类闹栅，就象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这些闹栅就会加锁，禁止出入。”（注四）

广州文革武斗是在七月二十号“华侨糖厂事件”及七月二十三号“中山纪念堂事件”后逐渐走向高潮的。但笔者认为，大规模把街街巷巷都闹拦截断，应该还是在八月十号和十一号关于劳改犯的流言传开以后，才陆续开始。此时广州市民已成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自发建立各街道联防纷纷行动起来，设闹，筑工事，加强值班……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对付传说中“兵临城下”的大批“劳改犯”。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夜开始，中国南方开埠最早的文明古城广州，终于发生了近代史上最惨烈的血腥大屠杀——

◇ 喋血街头，花城无处不吊尸

（一）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号，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

素有“花城”之称的广州，满城上下，冰清玉洁的白兰花，焰红如火的凤凰花，妖娆妩媚的紫荆花等争芬斗妍，竞相开放。街头巷尾，槛内幽兰花正香，墙头红杏暗如倾…… 上帝创造的自然界草木万物，衰荣生息，自由自在，毫不理会人类社会的风云险恶。

黎明永远给人带来新的希望。阳光更使人忘记黑夜的恐惧。

尽管最近武斗频繁，谣言满天飞，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工人要上班“促生产”，主妇得上街买菜，有些老头老太太还坚持去公园练太极拳——毕竟文化革命已经乱了一年，还有什么没见过？

今天，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可是，经历过这一天的每个广州人，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当他们清早开门上街后，扑面而来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恐怖震撼——

西关，自古商贾云集的广州最繁华之地，街道两旁的树上，电线杆上，吊挂着一具具龇牙咧嘴，蓬头垢面的尸首。一些十字路口死尸更集中，有的就横七竖八摊倒在人行道或街心岛的岗亭上……

人民路，广州市内的主要干道。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一群群的“人民”，表情麻木地围观另一些被吊死的“人民”……

黄沙，邻近旧时沙面租界的七号公共汽车总站，有三具死尸。围观的人说是劳改犯，也有人说是广西造反派。有附近居民说，夜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听到，但早上看到的尸体却是刚死不久的，因为肤色新鲜，还可以分辨出来……

北京路，旧称永汉路。位于城中心。“永汉电影院”门口正对的十字路口街心岗亭上，倒伏着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该电影院的背后，禺山路和北京路交界处，也有一上身赤裸者，双手被捆，吊死在树上。背后曾被捅过一刀。据说是小偷……

海珠广场，纪念解放广州的雕像脚下，坐着一具尸体……

东山，省委和军区所在地。公共汽车总站吊有两具尸体……

河南同福中路的吊尸，下巴还挂着长长的粘液……

市中心的惠福路，有一男一女两具吊尸，被写上“奸夫淫妇”四个大字……

郊区白鹤洞人民公社礼堂前的墟镇街口，也吊了两具死尸。因为头被衣服包着，看不出多大年纪。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还有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中山路，连新路……到处是死尸，吊尸！

从11号夜间到12号黎明，广州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三十九年后的今天，笔者采访了几十位当年的目击者，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所有被访者看到的都是12号早上以后的陈尸现场，没人能提供天亮以前的大屠杀任何细节和过程。唯一只有笔者的一位朋友的回忆，还隐隐约约留下一些猜测想象的空间——

（二）三个走投无路的“农场人”

“那一年我14岁，家住文德路。‘街道联防’开始以后，市民把附近建筑工地的棚架都拆了，用来筑路障。整条文德路几乎都被截成一段段，每个路口有闸门，夜晚关闭，居民轮流值班。

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我跑去看，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下午再去看，也死了。当时听别人讲，这三人是‘农场’出来的，这两天大白天都在附近徘徊，早引起居民注意。现在猜想，‘农场’可能是外地的国营农场，也可能就是指‘劳改农场’。死尸当天被运走了。派出所现场附近贴了一张告示，还记得内容是说明死亡原因的，有‘群众打死’四字。

推想这三人在广州肯定无处落脚，流浪街头，那天因为街道一下子都被拦截起来，晚上只好躲在闸街的棚架下过夜。可能夜里值班的居民太紧张，疑神疑鬼，看见有人影晃动就敲锣发警报，于是附近所有联防点都群起呼应，喊杀声四起，有胆大冲动的青壮年持长矛（磨尖的水喉管）和刀棍冲出来扑向黑影，夜宿者唯有拔腿逃跑，这更坐实了追捕者的怀疑，前后其他联防点的人也冲出来加入围堵，黑夜的混乱中不由分说，刀棍乱石齐下……

要问这事是那一天发生的？具体日期我记不得了，不过我肯定是广州打劳改犯的第一天，因为之前还没有。”

这位目击者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夜间发生的一切，但他根据现场所见所闻而作的推断描述，应该是大体可信的。至少，他本人还是12号白天后续暴行的目击者。事实上，“吊劳改犯”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11号一个晚上，12号白天以后，还非常惨烈地延续着……

（三）一个“畸形人”之死

讲这个故事的朋友——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号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先讲了某个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这一带都是干部宿舍，可能干部也参与了），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们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带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讲述者无法确定三十九年前发生的事，究竟在哪一个晚上。同样，下面关于“畸形人”的事，他也记不清是那一天了。“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口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象‘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此时刚放出来。我因为赶着去办事，没再停留。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笔者肯定此事就发生在12号，是因为后来在美国又得到另一位目击者的证实。他说：“那

天我离家走上吉祥路，先是在和连新路交口处，中央公园侧面，见一群男人——大大小小不同年纪男人，正围着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人拳打脚踢，用皮鞋踢……。是不是‘畸形人’？看不清，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当时他口角流血，还未死。我继续沿吉祥路上到前面的中山五路。路口东南角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被绑坐在树下，胸口一摊血，看来是被利器插死的。穿过中山路上教育路，又见有一女人被吊在树上。附近好像还有死尸，我害怕了，不想再看，转身往回走，又返回连新路，只见刚才那人已被吊在榕树上了……”

此地点只发生过一件吊尸案，两者所见肯定是同一人。后一叙述者虽然同样记不清日期，但他记得是陈尸最多的那天上午。他也目睹了教育路和惠福路交口的那具女尸（许多广州人都对这女性被杀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天正是八月十二号。

其实，“吊劳改犯”期间，光天化日下的暴行在广州城到处都有发生，更为大规模的屠杀场面出现在沿江路，广州当时最高级涉外宾馆之一的“爱群大厦”附近。

（四）珠江河畔的恐怖屠场

广州人没有不知道“爱群大厦”的。解放前她就是广州最高最摩登的地标性建筑。50年广州解放时，第一副巨型的毛泽东画像就从这里垂挂下来。几十年来，它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广州城，见证历史的变迁。文革中，广州近代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就在她的脚下展开。

爱群下面沿江的堤岸上种有成排的榕树。太平时节，榕荫下，游人凭栏欣赏珠江美景；情侣相依坐在石凳上絮絮私语；有人把鸟笼挂上枝头，在人行道上打太极拳；有人蹲在江边梯级摆开棋盘厮杀，时有围观者七嘴八舌品评支招；还有一些三轮车夫，把车搁在路边等客，三五个人就在江堤上围成一圈踢毽子……

“吊劳改犯”期间，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恐怖的画面：（以下主要是笔者的06年夏天的采访记录，被访的目击者都是笔者的朋友和亲人。）

“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象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这事我叔叔也知道，他现在已经移民美国了。”（肖先生，广州）

“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我不敢再看，赶快走开。是什么人？不知道。那时都说吊死劳改犯吧。场面很乱，我离得远，听不清。你问具体是那一天？记不清了。”（谭先生，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汤生龙日记》（注五）

◇ 千古奇冤，文革悬案何时了？

当年“吊劳改犯”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一共死了多少人？被打死的都是“劳改犯”吗？把人打死吊死的又是何人？此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疑问，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过任何答案。早在事发第二年，当时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曾联名要求省军管会调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文革以后，任何公开的官方文件，报章杂志，几乎从来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此事。（直到去年，广州市政府编的内部发行的《广州市志》，才语焉不详地用寥寥数语提到曾发生过该事件。）

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不过是动乱年代死了一些无名无姓的倒霉蛋罢了，文革冤死的人多啦，有必要都翻出来吗？你身居海外，有多大能耐？你不怕惹麻烦？——笔者的许多朋友，乃至亲人，都不赞成深究此事。

确实，要查清此事，回答上述所有疑问，非吾一人力所能逮。但此事不可不查，原因有三：第一，肯定这是广州文革中最大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肯定死者都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吊劳改犯”事件一共打死多少人？

最权威的统计数字，应该是来自当年负责收尸善后的省军管会纪录，可是不知何故，在已经解密公开的“省军管会值班日记”，可以看到事发前的逐日来电纪录，却看不到任何事发后的相关纪录。这是非常奇怪的。

当年“东山区批陶联分部”的小报报道，死了67人。（注六）此若只是传闻而已，或是一隅一时之数，就无实际意义。

最新的官方《广州市志》，对事件的过程完全回避，却提到“一夜之间数十人死亡”。（注七）既非整个事件的死亡总数，也太过笼统，实在无法采用。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曙明先生和笔者先后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统计死亡数字有何意义？我们不妨先看看文革期间广州武斗总共死了多少人。笔者最近分别访问了当年对立两派组织的头头，一起扳着指头逐个事件，逐个单位计算，把前后持续一年多的两派武斗，其中包括67年夏季动枪架炮的第几次大型攻防战，两派直接死于武斗的成员都加起来，实际总共大约也就几十人。相比之下，无论怎么统计，高潮只有一两天（零星延续不过三五天）的“吊劳改犯”事件，死亡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该事件在广州文革史中怎么能够一笔勾销？何况，死者又都是一些完全无辜的人。

“吊劳改犯”事件死的都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谜！

一般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部分广州市民听信了劳改犯冲击广州的谣言，惊慌失措，反应过度，在黑夜混乱中把一些流落广州无家可归的外地人，例如乞丐，流

浪汉，串连的学生，工人和夜里上岸入城的外乡农民等，当作“劳改犯”打死了。这可能占相当大部分。另外，精神病患，小偷及一些原来就被视为被专政对象的人，如组劳人员，工读学生，偷渡者和四类分子等等，都成了打击发泄的目标。至于真正的劳改犯，因劳改场已无人看守而出走，进入广州被打死的，可能也有，恐怕只占极小比例。

上述说法仅仅是推断而已，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死者家属事后出来要求平反伸冤。

没有听说过广州居民的任何亲戚朋友死于这次事件。

更没有任何官方材料公布死者的身份。

由于八月十二号早上广州城突然出现大批死尸，事后，这些人的死亡经过不得而知，他们的身份又说不清，整个事件就显得扑朔迷离，非常诡异。（有人因此判断是一个大阴谋！）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死者是何身份，哪怕他们是犯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自行执法，随意取人性命。何况当时并没听说这些人有任何的现行暴力犯罪。相反，他们恰恰都是在无法申辩，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被单方面的暴力处死的。

“吊劳改犯”事件的真相也许会永远石沉大海，但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是，事件中的死者绝对是无辜的。他们不幸成了那个悲剧时代的牺牲品，历史不应该把他们遗忘！那么多无名无姓的“贱民”，在号称追求“大民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些可能只是普通的（却自视高人一等的）下层市民，像围捕野狗一样无情地扑杀了…… 将近四十年过去，中国社会似乎业已发生巨变，据说已由封闭变开放，由贫穷变富裕，是不是应该到时候，给这些可怜的牺牲者一个说法了？

近年，广州最热闹的市中心北京路（步行街）上，发掘出宋元明清的历代古道，被用玻璃罩围起来，展示炫耀这个城市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文明历史。笔者不合时宜地抛出此文，就是要子孙后代都知道，在这同一条路上，也曾留下这个城市的耻辱——文明的耻辱！

对生命的极端轻蔑，对人权的恣意践踏——文革留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记忆永难磨灭！

谨以此文哀悼三十九年前今夜，因为无处栖身，无口申辩，无力自卫，无可逃循，而在我的故乡广州死于非命的那些普通人——劳改犯，小偷，流浪汉，乞丐，精神病患，农民，妇女，儿童和其他外乡人……

拼一首：布被秋霄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宝马雕车香满路，野鬼孤魂，无处化凄凉……

□ 2006年8月11日深夜于芝加哥（12月18日四稿）

附注：

注一，摘自《批陶联战报》，转引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注二，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广东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http://ysm2001.bokee.com/>。（以下军管会日记同）

注三，黄意坚，男，原中山大学数学系学生，文革中曾是“中大八三一”负责人之一，也是当时广州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武斗期间任旗派最大的联合组织“红联”属下“红警司”的政委。红联总部设在市中心海珠广场的广交会大楼内。67年8月“吊劳改犯”事件前后，维持

治安的广州公安系统因闹派性陷于瘫痪，“红警司”一度借重公安造反派的力量管理部分城区。68年两派大联合后，黄曾任省革筹常委，后作为“三种人”处理。现已退休。此段取自2006年5月笔者对其本人的访谈纪录。

注四，同注一

注五，汤生龙日记《大学岁月—武斗内战》<http://www.zigui.org/author.php?id=21682>

注六，同注一

注七，《广州市志—大事记》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 【亡灵祭坛】

### 血写的历史——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

· 赵 旭 ·

我很长时间已经不想回忆那些令人心酸的往事了，可是，今天《文汇报》上的一篇《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却让我思绪万千，不得已再一次去触摸那鲜血淋漓的创口。《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维尔那集中营里，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犹太人，在被纳粹杀害之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

大卫·博格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人们果然在事过不久，于1953年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建成伊始，马上在全世界范围内，致力搜集在大屠杀中每一位死难者的资料。其后又在2004年11月22日将“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借助这个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的姓名和相关的个人资料，于是，我们也就知道大卫·博格的名字。

于是，我突法奇想，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不能赶快抢救资料，收回我们半个多世纪来被极左路线所残害的那些无辜的冤魂。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兰州的街道格外的静谧，人们和往常一样行走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突然，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呜——，呜——，呜——”，刺耳的啸叫时起时伏，霎时间划破了兰州天空的宁静，紧随其后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卡车上押着一个个背插亡命牌的死刑犯。每辆卡车上四个反革命分子，他们被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牌，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在其姓名上打着红叉的大牌子。这些死刑犯的周围拥着几个膀大腰圆的军人，后面有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军人抓着细铁丝将反革命分子的头颅高高拉起。死刑犯们个个被勒得紫红着脸，眼睛暴突，街道两边的人们看到此情此景都站了下来，屏声静气地扬着头，在肃杀的气氛里木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在这二十多个死刑犯里，有一个就是我们尊敬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他是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在兰州被判处死刑准备执行枪决的。同时，押往刑场的还有原抗美援朝坦克兵、神枪手，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上学时被划为右派，在水北道区跑马泉公社劳动改造中，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右派学生林昭等兰大、北大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办地下《星火》刊物而被逮捕的张春元。还有因同情办《星火》地下刊物的年轻人，为彭德怀鸣不平，对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极为不满而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的原中共地下党员、甘肃省漳县原县委副书记、中共武山县县委常委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大跃进时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为武山县）的杜映华。

事隔三十六年的今天，没想到《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让我又将这痛苦的一段记忆翻开来，使我想起当年被枪毙后的布告上近距离用枪击碎死刑犯头颅的照片。

张师亮，河北省涞水县人。曾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期与范文澜、稽文



甫在河南大学被称为进步三教授。其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学院后改为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抗战胜利后，他到北平专管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被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叶剑英表扬。后又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历史问题，又调历史系任教，他是一个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因在该系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批评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他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讲到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而不能前进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阶级斗争不是万能的。于是，造反派们说其要破阶级斗争万能论，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张师亮枪毙后不长的日子里，四月十四日清晨，兰州农校教师，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回来的毛应斗先生的小妹毛应星，因为口诛笔伐林彪等人，在甘肃省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被枪决。四月二十八日清晨，甘肃省人民医院技术副院长、外科主任，著名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李树华由于他给甘肃省皋兰县农民做“肺叶切除手术”，病人不治而亡，后被诬陷为阶级报复、故意杀害“红五类”，被以反革命杀人犯在兰州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在枪毙李树华的这一天，由于刑车要经过兰州市郊东岗坡下的五里埔大桥，甘肃省卫生学校的造反派将全体牛鬼蛇神排队在桥头边上列队观看接受教育。熊如岩、李志桥、王继光等回到牛棚后，吓得精神错乱，其后一个个先后自杀失踪，后来只找到了熊如岩的尸体。

短短的十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被枪杀、被打死、被吓死、被诬陷后死得冤魂儿粗粗估计就有两百多万。我突然想到《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中说的，“‘直到每个人都有名字’，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记住一段历史、记住一个教训、记住一个人曾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而且还更在于记住每个生命都不容忽视，每个生命都不可践踏，每个生命都有其尊严”的话来。

□ 原载“紫金网”

~~~~~

【当事者说】

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 林 莽 •

悲逢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殉难四十周年之际，她的老战友和丈夫王晶先生约我写一篇实录，以资纪念。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难之首者。继其后，全国又有千千万万无辜者惨遭迫害。此实我国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奋起秉笔直书，仅欲言予幸存世上的未亡人。

1966年6月初文革工作组进校后，某日中午下班时分，我经过校门口的会客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两位副校长及其他几位校领导在里面，可能是在开完批判他们的会后，呆在那里等学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给我很深，那就是卞仲耘校长脸上的笑容。我心想：“这时，她还能面带笑容，可见压力不大，比我这个右派强。”而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我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上午可以在图书馆工作，下午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我听了，心情是沉重的。

没想到，时间未隔多久，情况却有了变化。

工作组被撤消了，这对我关系不大，而对卞仲耘她们，则至关重要。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运动搞得不红火。浮皮蹭痒地批了批校领导，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应按十六条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尊重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条最高指示一下来，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果然红红火火起来了。

那是8月5日的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的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嚎叫声，越来越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这实验楼越来越近了。小操场就在这座楼的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打开纱窗，把头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声音。在她后面跟着的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一个破脸盆，敲在上面的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多。她嘴里喊出来的话，内容与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报自己的姓名和职位不同罢了。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枪杵的立即放大嗓门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嚎到这时分，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难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个沙哑的喉咙发出响亮的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们狂喊着。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大抵也就是命令她们喊响些吧？“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这样的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

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而这笑声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实验楼。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

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

没过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来叫我跟她走。这次却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刚进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之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反思当日，假如红卫兵不准我离开，而我又坚决拒绝抬尸，那我就会倒于乱棍之下，多死一个，这是完全可能的。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学校，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因而女红卫兵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她们打死一个卞仲耘，不过是小试牛刀，体现一下不怕出乱子的胆识，做出首例示范，从而起到推广全国各地的作用。全国打死的人无数，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何足道哉！

作者简介：林莽，江西人，现年90岁。早年在方志敏、范学陶领导下参加革命。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著名作家，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主讲苏联文学。1952年因与胡风相识，坐牢一年。后降职到北京师大女附中任语文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创作自由。文革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轻生一剑知》（作家出版社）、《长夜三部曲——爱情、痛苦、死亡》和《玉兰表婶》（后两书均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玉兰表婶》已由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  
【往事如烟】

教育部红卫兵——文革点滴记忆

• 姜和平 •

文革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机关院里，由本部工作人员的子女组成了一支红卫兵，成为教育部文革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支红卫兵于1966年6月4日成立，大约有三十名成员。他们自豪地宣称，教育部干部子女红卫兵是继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之后的，世界上第三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龙路学校等校的中学生。最小的上初一，十三岁；最大的十八、九岁上高三。他们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学校都停了课，他们从此不再去学校，在大院里“就地闹革命”。大院里称他们为“小红卫兵”，以区别于机关干部派别组织。小红卫兵当中有近半数成员的家长是司局级干部。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于谁的家长是什么级别，从小便耳熟能详。谁的父母级别越高，谁就越趾高气扬。大多数人的家长是中共党员，即所谓“革干”出身。有少数成员的家长不是党员，出身职员，算作“红外围”。红卫兵的头目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家长级别最高，母亲是部机关党组书记，父亲是在海军大院任职的军官。他本人还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员。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动用夫人江青，并利用青少年造反。这两点特征也体现在教育部的文革中。教育部文革的烈火首先由夫人参政点燃。1966年6月初，以办公厅主任赵秀山、司长肖克杰为代表的左派们率先开始批判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后赵、肖和炮轰蒋南翔的少数造反派在本司局都受到了压制。这时蒋在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宣部代部长张际春对教育部文革的几点指示。几天后，张际春的夫人罗屏于6月9日忽然亲临教育部“辟谣”说，蒋所传达指示纯系谣言。初夏的这天天气炎热，人们簇拥着，呼喊着“罗屏同志”，争着和罗握手。曾经反过蒋的左派们一下子都成了风风光光的英雄，他们扬眉吐气地见到了救星。而保过蒋的“保皇派”则声泪俱下地痛表反戈一击。人们情绪激昂地喊着“向罗屏同志致敬！”“罗屏同志的到来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蒋南翔闻讯赶到时，罗正在院子里热烈地讲演和慰问遭迫害的左派们。蒋例行公事地试图与罗握手，周围的小红卫兵们急得满头大汗地喊，“别跟他握手！他是坏人！”罗立即缩回了手。从此，小红卫兵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形象开始在教育部文革的舞台上显露头角。

罗屏的到来是教育部文革的转折，往日平静的大院从此卷入了文革的狂涛骇浪。罗的到来还宣判了蒋南翔政治上的死刑。蒋成为中央定性的走资派，是文革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从此，蒋成了大院里的头号敌人，蒋被大会批、小会斗。在各司局和全部的批斗会上，蒋先是弯腰低头接受批判，后来被喝令跪下，常被推来搡去。大院里批蒋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一次，一个上初一的女红卫兵厉声质问蒋南翔，“说！你和蒋介石什么关系？”蒋答，“没有关系。”“胡说！你不老实！你们都姓蒋，你们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没关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红卫兵怒斥道。有几位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写了大字报贴在和乐堂后墙上。大字报全文是，“蒋南翔，大坏蛋，白吃人民大米饭”。那稚拙的字体得到了人们的啧啧称赞：“这孩子造反精神多强！”“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呀！连小孩都发动起来了！”

的确，文革充分利用了青少年的无知和冲动。文革初的6、7、8月间，在大院里监督黑

帮劳改，勒令他们唱豪歌，大破四旧，到处抄家、肆意打人，都是教育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些小红卫兵显出了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的革命造反精神。红卫兵成立之初，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庄严肃穆地宣誓：“前辈为革命洒尽碧血，后代保江山掏尽红心”。他们到国防部一本正经地递交请战书，要求去越南参战打美帝。为了备战练就铁脚板，有的红卫兵从西单到厂桥一路赤脚步行。他们还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收租院”泥塑，以增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他们排着队走在街上，歌声嘹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自从6月文革开始，他们就不上学了，每天聚在一起念毛语录，唱革命歌，写大字报、大标语。有时候还去中宣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是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进行革命串联。有一次小红卫兵到中宣部，正逢那里揪斗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张盘石、张子意等大小“阎王”。于是他们往中宣部楼上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牛鬼蛇神窝”的对联。回到教育部，小红卫兵在本部办公楼上也贴了同样的斗大字的对联。

教育部大院前身是清朝时的王府，院里有不少具文物价值的古迹。大红门和二宫门之间有一对石狮子，一公一母座落在二宫门外两侧。这对石狮和天安门前、故宫里的一样大小，一般气派。在破四旧的狂潮中，这石狮也成了革命对象。这天，小红卫兵们在石狮面前挖了大深坑，用粗大的绳子套住石狮，借用了两辆卡车，高喊着口号，用冲天的革命干劲硬是把狮子拉倒在坑里“活埋”掉了。

大院里竖起了高音喇叭，日夜广播，批判阶级敌人的三反言行。广播员由小红卫兵担任，愤怒和响亮的声讨响彻大院上空：“蒋南翔鼓吹资产阶级白专，他口口声声说，清华大学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实际上摇来摇去，摇出了修正主义苗子！”“蒋南翔丧心病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恶毒攻击说，‘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再发展了。’”“蒋南翔说，延安整风，甄别了十年，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掌握好政策。蒋南翔妄图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打倒蒋南翔！”

有一次，有人发现大操场上有大字报碎片。小红卫兵认定这是阶级敌人破坏。于是他们在大院里彻夜巡逻，保卫革命的大字报。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歌声在大院里处处回荡：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撤他娘的职，就滚他妈的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1966年8月，小红卫兵在教育部院里开始抄家。这天他们来到大院里的西跨院宿舍，到对外司副司长钱其琛家抄家。钱曾任驻苏联使馆二秘，不久前离任回国。小红卫兵因此把钱视同苏修。钱家有些从苏联带回来的艺术品、用品等，都被视为修正主义黑货，他们一边喊着“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一边把那些黑货砸烂、烧毁。当时钱夫人周寒琼和十岁的女儿京京在家。红卫兵发现他们有一套斑竹做的艺术品摆设，是手巴掌大小的家具，精致小巧，也不分青红皂白上前一脚踩了个稀巴烂。抄完家，有人出主意“放水淹黑帮家”。于是他们从附近的水房拉过来长长的橡皮管子，向钱家放水。然后又冲着呜呜哭泣的京京喊了一通“打倒苏修！打倒黑帮分子钱其琛”才离开。

红卫兵把各司局揪出的走资派组成劳改队，勒令他们每天早晨戴着自制高帽到小食堂旁边集合，然后在大院各处扫院子、扫厕所。这些人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或叫“牛鬼蛇神”，约有十几人。其中除了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外，还有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沂，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对外司司长李涛，副司长钱其琛，小学司司长张健，中学司司长周子明，《人民教育》总编辑章炼烽，中专司司长肖敬若，肖岩副司长，鲍正鹄司长，司机张景玉等。他们每天集合后，要听小红卫兵训话，喊打倒黑帮分子XXX（自己的名字），交代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还要将自己写的“劳改日记”交小红卫兵审阅。小红卫兵指定肖岩（肖的丈夫是《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教其他黑帮唱牛鬼蛇神嚎歌。

文革开始，打人尚未成风。有一天小红卫兵在监督蒋南翔劳改时，一名高中男红卫兵对蒋拳脚相加。这时，办公厅机要员王耀鲁路过正好看见，他喝住这个红卫兵说，“不能打！你们把蒋南翔打坏了谁负责？”但是这句话立刻引起小红卫兵群起攻之，他们七嘴八舌地斥骂比他们年长三十岁的王，“你臭老保！蒋南翔是你亲爸爸？你心疼走资派是怎么着？告诉你，打死他活该！”王耀鲁从此灰溜溜地成了院里臭名昭著的保皇派。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红卫兵说“要武嘛！”

从此社会上红卫兵打人、打人致死时时发生。教育部邻近的师大女附中校长被本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副校长胡志涛家住教育部大院，她的丈夫丁丁是教育部的一位副司长。胡在学校挨斗，被打成重伤，肋骨断裂，不能行走。仅一街之隔，胡的女儿每次都要用平板车把遍体鳞伤的母亲拉回家。第二天，女附中的红卫兵又来到胡志涛家，喊着革命口号把她再揪回学校批斗、殴打。受到如此耳濡目染的教育部红卫兵们越加信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此时任何粗鄙的语言和暴力的行为都是可贵的造反精神。从此他们打人也越来越凶。在抄李涛家的时候，小红卫兵对李拳打脚踢，把李的衣服撕破。在揪斗黑帮时，凡挨斗者为女性，必定给她剃阴阳头。有一次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斗黑帮，小红卫兵给教育科研所的范祖珠连鬓带拽剃了阴阳头，范的头上被剪刀弄伤多处，鲜血淋淋。她浑身还被吐满了吐沫。几个男红卫兵围殴身材高大的高沂，对高没头没脑地痛打。高顿时头破血流，遍身青肿。事后高去邮电医院治伤，经诊断“眼眶骨折”，几乎伤及眼球。有一次，小红卫兵们议论说，近来阶级敌人不老实，于是把几个黑帮抓到红卫兵总部，皮带棍棒，拳打脚踢，一顿狠打。其中对张健打得最重，张直呼“救命”。因为他们说张最“嚣张”。

8月下旬的一天，小红卫兵来到蒋南翔家抄家。蒋住在教育部大门对面的一个独院。抄家，即先把红卫兵认为是四旧的东西能砸的都砸烂，能烧的都烧毁，再把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罪证的东西抄走。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还要没收所有的刀、剪。在抄家过程中，红卫兵发现蒋家有很多中央文件，有的带有“机密”字样，还有很多照片，其中有一些蒋和毛泽东的合影。红卫兵们翻看着怒斥说，“蒋南翔你这个黑帮，你还配跟毛主席照像！”于是他们派一红卫兵看守这些文件。其余人继续革命行动。抄蒋家是小红卫兵的单独行动，没有本部干部或其他成人在场。蒋八十高龄的母亲和六十多岁的姐姐在家。在场的还有在蒋家工作的公务员姜树桂。抄家行动已近完成时，蒋家一片狼籍。以红卫兵头目为首的几个高中男生开始轮流用铜头宽皮带毒打蒋。他们喝令蒋面向打人者下跪，再由施暴者用一只脚踩住蒋的头，使其紧挨地面，动弹不得，然后用皮带猛抽蒋的后背。时逢夏天，蒋穿一件白衬衣。他们打了一阵，撩开衬衣一看，蒋的后背已经皮开肉绽，血痕累累。其中一红卫兵说，“不行，还没组成图案！”于是再往伤痕尚少的地方抽打。他们毒打蒋的时候，强迫蒋母和姐姐在旁观看。被指控为“地主婆”剃了阴阳头的蒋母和姐姐在一旁瑟瑟发抖地抽泣。几个十七、八岁的男性对这两位老年女性也施以皮带、拳脚。蒋母和姐姐挨着打凄厉地哭叫着姜树桂，“老姜啊！”姜在一旁说，“你们叫我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红卫兵打累了，其中一打人者问蒋的姐姐，“他反党，该打不该打？”蒋

姐颤栗着说，“该打。”“好，你说该打，你就得打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个红卫兵递过皮带，强迫蒋的姐姐抽打蒋。被剃成阴阳头的蒋的姐姐一边哭喊着，“你反党，你反党”，一边抽打自己的兄弟。按照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命令，当天晚上，小红卫兵押送蒋母和姐姐到北京火车站遣返回原籍。蒋母回到原籍后不久便去世了。

挨打最重的是蒋的司机张景玉。蒋南翔成了黑帮，和蒋有工作关系者都被列入“蒋家王朝”而遭殃，连司机张景玉也被指为特务、历史反革命。张往日言语不多，在往年部里的新年联欢会上，常表演几个小魔术节目。张家住在邻近的宏庙胡同。他家孩子多，妻子是家庭妇女。小红卫兵到张家抄家时，为了找出“变天账”，把他家屋里挖地三尺。抄家后，张即被小红卫兵带走关押和劳改。张表演魔术用的道具都被说成是特务用具抄走后砸毁。这天抄家后，张被带到小食堂旁边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命令他交代特务罪行，并残酷地殴打他。他们毒打张的工具是一种包着橡胶皮管子的直径约一寸的钢丝鞭。红卫兵对张劈头盖脸地狠抽，只消几下，张的脸部便青紫肿大得面目全非变了形。张不住地惨叫，一施暴者狠狠地说，“好哇，你还敢哎哟？”接着是更加凶猛地抽打。从此，在院里的劳改队伍中，多了一名脸部变形的蹒跚行动者。

从1966年秋开始，四旧破得差不多了，打人、抄家风有所减弱。教育部红卫兵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部机关两派的派仗。

1966年5月25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此举使卢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但是很快有人揭发卢在1949年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苏省反省院，有自首变节嫌疑。于是“北京公社”一派便开始攻击卢。小红卫兵们立刻到卢家造反，“打倒大叛徒、政治大扒手卢正义”的标语和侮辱卢家人的大字报糊满了卢家门窗。在此之前，小红卫兵抄家、打人等行为全都所向无敌，没有受到过阻止。但是，红卫兵到卢正义家造反招致了保卢一派的指责。红卫兵没有丝毫退缩，在斗争会上用攻击谩骂的语言激烈辩论。哪里有派仗的战场，哪里就有怒发冲冠和唇枪舌剑的红卫兵。有一女红卫兵的父亲和她不是一派，她在大会上“控诉父亲的迫害”。有一次她在操场上还指着父亲的鼻子，当众辱骂：“你是小丑！”

正当反卢、保卢之争日益激烈、难解难分时，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来教育部作重要指示。刘下结论说，“卢正义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什么？！不可能！坐在下面听的小红卫兵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急得哭起来，他们登时大喊大叫，“他是大叛徒！”

红卫兵不能服输，他们喊着毛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追到中宣部，在礼堂里围住刘祖春数小时，和他激辩并逼他表态。

但是，小红卫兵也不是逢人必反，他们保教育部长何伟。高教部长蒋南翔被“批倒批臭”以后，中央指示高教、教育两部合并为新的教育部，由原教育部长何伟任部长。没过多久，院里一派造反组织“延安公社”开始炮轰何伟。小红卫兵保何，一是因为和他们观点近似的一派组织“北京公社”保何。二是听说何调任教育部长前在河南省委工作，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上级。前不久毛接见红卫兵，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焦的女儿。因此焦的上级怎么能是走资派呢？再说，何长相慈眉善目，不像坏人。为了寻找支持，小红卫兵去北大附中求见红旗战斗小组头目彭小蒙。前不久彭小蒙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中表现出色，受到正在北大讲话的江青等中央首长的高度赞赏。江青还和彭拥抱，亲吻。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里，指名道姓地说他对彭“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讲演“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们跟着毛主席走定了！”因此，彭是文革

初知名度最高的造反明星。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小红卫兵们来到北大附中，他们先听说彭最近很忙，现正在睡觉。但是只等了片刻，又听说彭起来了并有请。他们来到一间教室，见到彭身穿旧军装，腰系宽皮带，睡眼惺忪地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是教育部红卫兵。最近部里有人炮轰何伟。”红卫兵一头目说。

“什么？何伟？我对他印象不错嘛！”彭的断言使红卫兵振奋。

彭问，“王任重你们知道吗？”

“知道！他刚和毛主席一块畅游长江。”红卫兵响亮回答。

“王任重有个孩子叫三宝，你们知道吗？他提出教育要革命。有人要压制他，但是何伟坚决支持他。所以何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彭继续鼓励红卫兵们，“我告诉你们，要革命就不要怕嘛！砍掉脑袋不就碗大个疤嘛！”

面见彭小蒙后，红卫兵更加坚定了保何的决心。他们在对立派围攻、揪斗何伟时，喊着“何伯伯”挺身围在何四周，和大人们一起脸红脖子粗地和对立派辩论，尽力斥退反何派。

1967年6月4日，经过一年文革洗礼的红卫兵在院里的礼堂“逸仙堂”演出了一台自编歌舞节目，纪念红卫兵成立一周年。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戴着大袖章，连唱带跳地把舞台踩得咚咚响：

“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

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1968年4月，红卫兵的对立派延安公社头目被公安局逮捕。1970年，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两年前神秘失踪的卢正义。红卫兵们确信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证明自己在文革中的派别观点正确无疑。

1968年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教育部逸仙堂讲话。陈对文革作了一番指示，宣布了中央对教育部机构改革的决定，陈说，管理全国教育，有三十人就够了。现在部机关上千人，要下放。从此教育部被撤消，由国务院科教组行使职能。

这时候，红卫兵的使命完成。老三届响应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很多人相继离开了北京。红卫兵中有人去北大荒、内蒙、云南，有人跟着家长去了安徽省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还有人越境到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临别前，其中几人随便抓了院里人家养的鸡，到香山公园吃了一顿“百鸡宴”。

三十年后，1996年年末。当年的教育部红卫兵相聚在和乐堂。人们久别重逢，兴奋叙旧。提起文革往事，有人又唱起了造反歌，跳起了造反舞。他们唱得还是那么自豪、那么亢奋，似无悔意：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后代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歌唱领袖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写于2006年10月20日 文革四十周年之际



□ 原载《观察》网站

~~~~~  
【痛定思痛】

四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提纲）

• 任彦芳 •

今天我在整理文集的《谈文说艺》卷时，正值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官方媒体没有一点反应，是想不要提起这些令人难过的历史吧。但是，一个不能从灾难中反思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可悲的民族。今天，过去四十年后思考应该是“四十而不惑”的思考，然而直到今天，我仍不能说已经不惑了。我在那十年中，大约有近六年时光是在接受审查中渡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8年，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第三专案组宣布我的全部问题清楚，由吉林省给我彻底平反，并退回了我写的全部“罪行交代材料”及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一些大字报、发言录音稿。厚厚的两包，共计有六十多万字。这是我在六年里所写的反复交待，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的一部作品，这是用血和泪写出的。有真实的表白，也有为了生存而写出的谎言。重新翻阅这些文字，成了我四十年后最珍贵的反思资料。它们好像出土文物，目睹这些出土物，会叫我回顾起那非常年月，竟产生了错觉，这些文字真是我写的吗？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吗？四十年后，我自己都怀疑起来了。

手抚摸着这些出土物，我确切地感受到那个年代确实在中国大地上存在过。

我个人在这十年内，分如下几个阶段：

1966年3月，我在兰考四清时入党，参加了中央文化部领导的《焦裕禄》电影创作组。创作组正讨论由李准起草的剧本提纲时，接北京令回京学习《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文化部赵副部长宣布创作组暂时停止，各回本单位参加运动，我于6月11日回到长影，此时吉林省委工作组进驻了长影。我因出身红五类，自然成了依靠对象，参加了工作组领导下的专案组，整理总编室重点人物张天民、房友良，李威仑、于敏等人的材料。后又被选为总编室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我接受了五七年反右派的教训，一切听工作组指挥。

1966年10月，我接受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指派到北京中央文化部请示由长影继续搞《焦裕禄》电影事。到文化部才知首都文艺界正造肖望东部长的反，见不到领导。我便开始到各大学学习。接受了当时北京的新观点。我多年压抑的心得到一次释放。认为毛泽东要行大民主，可以把所有有问题提出来了。明白这次运动和反右时不同了，是对着当权派的，所谓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于是回厂后，自动自我罢官，不当文革小组长，提出自己对长影运动的看法，从保守走进造反队伍。我提出“一条黑线，两个宗派”，由同意与反对此观点而使长影分成两派，我自然成了一派的头脑。我所收入本集中的几件出土物，就是这个时期由群众组织印出来的传单。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我的狂热。这是一种压抑情绪的宣泄。还有一个我在大会上五个小时的讲演稿，更全面地表现了当时的思想，对立的派别为了批我而从录音上刻印成小册子，约有五万多字，此处不收。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夺权，长影的一派夺权，我们与这个造反大军因而发生了分歧，被迫进入了社会。进入七月，长春开始武斗，我宣布退出此次革命运动，因为变成了“武化大革命”。我从此成了逍遥派，回到了河南兰考及开封家中，并对此次运动进行新的思考。

1967年8月，由于我在河南省的言论由兰考革命委员会把材料寄到长影掌权的造反派手上，成为导火索，我的问题全面爆发。我开始接受审查。最后以“为刘少奇翻案、为右派翻案、为文艺黑线翻案的反革命集团头头”定罪成立我的专案组。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长影，重新调查我的问题。1968年11月，工宣队宣布对我解放，公布调查结果。于是我从阶下囚转眼成长影整建党领导小组的群众代表。此时才知兰考未把我的关系转来，我要重新入党。1969年，我调入当时刚成立的省文艺组工作。

1970年5月，开始清查五一六。我再次被揭发出来，以“现行反革命”言论接受审查。我先在长影接受批斗，后来送到省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直到1973年春离开干校宣布“解放”。这三年多的时间，几乎让我家破人亡。1978年吉林省对我彻底平反。因我而被株连的家属回到文艺团体。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言论获罪。主要“罪行”的交代有以下方面。

1、我写大字报《不明白》。我在大字报里提出，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为什么四清时派工作组就是正确的？说这就是为刘少奇鸣不平。我交代反动思想说心里是不明白，刘主持工作时派工作组是毛泽东同意的，那是党中央的决定，如何成了刘邓的错误呢？我想过去搞土地改革时也是派工作组的，这次为何就错了呢？后来想，这是不是有点对刘少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2、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从《海瑞罢官》引发，就说这是为彭德怀叫屈的毒草。我说，当年毛泽东不是提倡过要学习海瑞、魏征精神吗？我看不出这个戏有什么问题。我交代反动思想说，我一直对彭德怀挨整想不通。因为我也曾在北大时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事，那些问题确实存在。后来证实那是对的。我心想就是应给彭老总把案翻过来。

3、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但在反右派时，他可是左派，他把那么多作家打成右派，实际上他和右派并没有区别。这引起我对当时及历次运动中的左派的怀疑。吉林省委为了保自己，就说自己是和周扬等黑线作过斗争的，实际上并不如此，根本就没有什么路线上的斗争，有斗争也不过是宗派之争。于是我在长影大会上发言提出“一条黑线，两个宗派”，整我者称这是以我为首的“翻案集团”的纲领。我交代思想说：我是以否定一切的形式打“左派”，实质是为打成右派及右倾的人鸣不平。根源是我曾是这些运动的被整者。反右时，我差点成了右派，反右倾时，我受批判半年，大学毕业仍带着“对三面红旗有很多错误看法”的鉴定离开北大的。我交代时说，我确实认为一些右派是冤的。（长影掌权的一派看了我的档案后，贴出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右派”，从而找到了为右派翻案的根源）

4、在第一次打成“翻案集团小头头”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成为我的最重要的罪证的是我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上的批字。为此引起省里的重视，把我的《毛泽东选集》抄走，将我在上面的批字拍成照片。

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读到这些，我当时做了这样的思考。我们没有经历几年新民主主义，便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这篇文章发表时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不到五年，为何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一九五四年在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便宣布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了，这是长期吗？是不是过急过左，而民主主义没有实现完成呢？

在中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便想在封建主义土地上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吗？

刘少奇在1949年对天津工商业资本家的讲话，在当时是刘少奇的罪行称他宣扬“剥削有功”，但当我学到毛泽东的文章时，我便认为刘少奇并没有错，他和毛泽东这一观点是一致的，为何刘少奇便错，毛泽东便是对的呢？

于是我在这书上批字，把这段话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照应如何理解？这个如何理解的提问，我曾和同室的朋友交谈过，运动深入对我揭发，朋友把我在毛泽东著作上批字的事揭了出来。于是军宣队便认为运动深入挖出了“很深的现行反革命”了。在批我的会上我只能老实说出我的“反动思想”。因为有书上批字为证，无法再辩解。

5、为刘少奇鸣不平的另一个重大罪证是关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议论。我说，这是当年全党都学习的一本书，突然变成大毒草，变成黑的了，实在不好理解。1962年在人民日报上重发此书，不是党中央批准的吗？当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现在说他的要害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说服力不强。我同时说，刘少奇一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刘成了白区工作的典范，也是在《毛泽东选集》上写的。为何一下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这么多年共产党组织没有审查出来吗？他都成了国家主席了，给谁当内奸，他要图什么？他是国家主席，如果要打倒，也应该通过全国人大，走个过场吧。现在说打倒就打倒，怕老百姓心里不服。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与河南省一个同志私下的交谈。知道他也只揭发了关于《黑修养》的几句话。我一直不承认此揭发，故总无法定案。

以上几点属于“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为刘少奇翻案”罪的主要内容。

6、关于对林副主席攻击的言论。我原话是：中国的军队不是一个四野，不是一个林彪元帅。现在把别的老帅都打倒，林能不能统帅全军，我真担心，别的将领不服，中国会发生军队动乱啊。在党章上写上谁是接班人，这可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批我时上纲说，我不相信林能领导全国军队。

7、我在河南说过：周总理会处理各派，都是革命群众，不支一派压一派。这事就要和稀泥。周总理可以说是高级的泥瓦匠，和得最好。上纲说，我攻击周总理是泥瓦匠。

8、关于攻击江青的言论。1967年8月，我们被迫到沈阳市，在沈阳大广场，我参加了大辩论。宣传受压一派的观点。不久武斗起来。我认为是因为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引起的。我写出感想：武斗方知真无能，最愧气质是书生；难道强权是真理？鲜血洗我眼渐明。在我派群众集会上说：自从江青同志提出“文攻武卫”后，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各

地都动起了枪炮，我们是文化人，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参加武化大革命。所以我宣布退出一切组织，不再参加活动了。我也劝同志们不参加，你打死人要偿命，你被打死死得不值。此诗和言论上纲为攻击文化大革命是武化大革命，及攻击江青是武斗挑动者。

9、关于对样板戏的评说：江青说《沙家浜》的第一号人物是郭建光，这不符合剧本的实际。因为谁是主要人物，不能从政治作用上说，而要看谁在剧的矛盾中心。这个戏的中心人物是阿庆嫂，怎能说是郭建光呢？江青搞的《白毛女》把杨白劳改成反抗者，举起了棍子打人。这并不如原来歌剧中的杨白劳感人。原来的被逼自杀也是一种典型。不能说只有反抗才典型。如果进一步说，那年月有了红军了，他应该参加红军不更成为自觉地反抗了吗？只要一种典型，不能有不同的典型，便没有真正感人的作品了。这种议论也成了攻击江青亲自培育的样板戏。

10、姚文元发表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我向一些同志说，这个评论不能服人。那篇松树风格，我早就读过，写得好，是激发人向上的作品。现在，陶铸成了叛徒，对他的文章便作别论了。如果他不是叛徒，这本书就不能这么说。那还得有个客观评价标准吧。

以上几点属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我把交代的内容，反复地交代。当然，我对两个人在一起说过的话，则基本采取不认的态度，或者把主要内容淡化，所谓避重就轻。因此总难以定案。

◇ 四十年后的再思考

文化大革命，应叫大革文化命。是中国的一场空前浩劫，空前地对中国文化的大破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新的觉醒。它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一是封建主义的土壤所产生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它产生的领袖必是封建帝王，帝王必然要金口玉牙，要用现代迷信支持其专制；这不是个人因素所决定的。这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原因。是历史的必然性。这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完成听从一人意志的封建复辟。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复辟。二是国际共运从第三国际列宁所实行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便是党的专政，实质是党的领袖专政。领袖驾凌于共产党之上。苏联产生了斯大林的独裁，中国出了毛泽东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独裁，今天朝鲜的金家父子独裁，一切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全都要个人独裁，不令人深思吗？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半个世纪，却仍没有党内的民主可言。不能说这是个成熟的党。这样的大党竟不能制止独裁破坏法制，国家主席不能用宪法保护，百姓更谈不上人权了。谁之过？不能说是那个人。是每个中国人都应思考的责任。党的九大，竟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这个党代表大会不是一人的工具吗？后来又开会一致通过为刘少奇平反。那些中央委员起了什么作用？原来中国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这些革命者多数头脑里是打天下坐天下要拥戴好帝王的思想。对毛泽东的迷信就很自然。从对毛泽东喊万岁便知与封建时代没有多大区别。这场悲剧是毛泽东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面对着这场悲剧，所有中共的中央委员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反思，所有中国人民都应反思。你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四人帮，推给毛泽东完事啊。

试想，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国家，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吗？我们从没有听说过，美国要喊在某个总统为首的领导下，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要把个人驾凌于党和国家之上？民主国家不可能产生个人迷信。中国今天要使悲剧不再重演，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行切实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一个民主国家，实行宪法所保障的一切民主权利。真正走向共和。从国民的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还要相当长的时间。

一切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夺取权力。毛泽东由于与刘少奇发生过意见分歧，便想把刘搞掉，便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毛先利用林彪宣扬的对他的个人迷信，把学生鼓动起来造反，把刘少奇搞掉，把一切阻碍他意志的人，不管你是谁全都搞掉，罪名全是莫须有的。由于对毛的迷信，群众相信这是在保卫神圣的路线。群众之所以能发动起来，且对当权派如此行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这些人如毛泽东所说，官做大了，不再关心百姓，官僚主义。所以群众有气，一旦爆发便不得了。这是群众参预这场大动乱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人民对执政者的不满情绪的宣泄。这是长期受压抑的心理的宣泄。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种夺权：毛泽东的夺权，所谓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把权力夺回来。群众也有另一种夺权。那是要求有人权，这是一种夺取人权的行动，也就是夺取他们的生存权和自由表达意志的民主自由的权利。

利益是行动的动力。群众中分成了两派，所有参加者无一不是和自身利益相联系。有的造反是想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保守，也是想保自己的已得到的权益不失去。造反到底是怕如不能胜利便会重受压制，失去现有的地位；当然也有个人野心家想通过造或保的行动得到自己的权力。这所有的人无一不打出个旗号，那就是保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

解放后，毛泽东发动了无数政治运动，并把全国人民无一不和政治相联起来。这些运动，大都压抑了人民的内心情绪。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情绪的宣泄爆发。这便不可避免地有破坏性。毛泽东让群众对所有干部冲击，便给人一次宣泄机会。群众把对共产党干部的脱离人民多年的不满发泄出来。这才能让这么多官员吃苦头。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深知此点，这才有了他在重新执政后的思考。如果说这场文革的作用，便是促使中国党的领导人从他们受害中重新思考中国社会，这才有了中国的进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正确之路，并且提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前途的正确论断；才有了彭真一言九鼎力主中国农村首先实民主自治，对中国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的教育和训练。

◇ 毛泽东的悲剧，是我思考了四十年的话题。

我坚持认为，毛泽东主观上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着想，他自认为是最广大群众利益的代表。但是检验要看社会实践而不看宣言。他在建国后的实践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使中国人民进入了苦难的深渊，使中国社会大倒退到封建奴隶制状态。为什么会有此历史悲剧发生？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导致行为的失误。毛泽东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写出的《矛盾论》，接受的是列宁的思想，把对立面的斗争认为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他对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批判为阶级调和。斗争哲学在没有取得政权的革命时期是有用的哲学思想，但在取得政权后仍旧用斗争哲学，就必然引起社会混乱，没有一点进步作用了。这是二维思维。中国古代的老子提出的是三维思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只有实践三维思考，才可以进入和谐社会。在建国后，毛泽东用斗争哲学不断地进行斗斗斗，如他说，中国十亿人口，不斗行吗？因此他不断地搞阶级划分，本来土地改革完成了，他仍旧要分农村阶级，拉一部分人，仍旧用革命时期的阶级路线，而在共产党内部也在不停地斗斗斗，因为“党内有资产阶级”。中国只有在停止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才有了好的前程。

毛泽东在未取得政权时，提出的对中国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提出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对国民党蒋的独裁进行过多么深刻的抨击，他对民主政治是如何地渴望。但从他掌握了政权后，便一步步走了独裁之路，且比国民党时期在控制思想上更加全面专政。使得中国思想处于僵化状态了。今天重温毛泽东当年写的文章，是发人深思的。

毛泽东不知道社会主义，他自己却自食其言，犯了他自己批评的错误，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发展资本主义，却要搞社会主义；而他的社会主义，便是斯大林式的苏联假社会主义。悲剧在于他认为那就是他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结果使中国生产力受到大破坏。1958年，更想一步到共产主义，结果是让几千万老百姓死于非命。本来共同纲领规定中国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他在1953年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按苏联模式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使中国走了大弯路。直到邓小平提出不要说姓社姓资之后才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由于毛泽东不知社会主义，他不了解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他从不出国，更不知美国等发达国家，他只知向苏联一边倒，一切学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只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阵营，在国际路线上只能犯下更大的错误。只有在苏联与中国反目，不同意他的大跃进路线后，他才有些觉悟；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苏联提出反个人迷信对斯大林的独裁清算之后，毛泽东觉得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他才把苏联当成了敌人，怕他成了将来的中斯大林的命运，这便成了他在清除中国赫鲁晓夫的大革命的根源。由于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结果，我们以保家卫国之名去朝鲜打联合国的军队，使中国多少万优秀儿女死在那块土地上，没有给那国人民带来幸福，却使他们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到今天我国才对那邪恶国家做出正确的表态。这实在是中国人民的大幸。我们终于在国际上走向与全世界一致的轨道。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后，必然要实现文化一体化，前景是全世界政治一体化，那便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的到来。我们必须和世界同步，才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就要摆脱毛泽东的阴影，从列宁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苏联假社会主义实践中解放，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悲剧产生的根源，接受历史痛苦的教训，才是民族之大幸，才是中国光明之未来。

◇ 历史的疑问

四十年过去，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能不思考。在社会上我听到和想到的仍旧有不少疑问。由于资料和档案的不公开，这些谜便很难解开，只有等待历史来评说了。

对林彪集团的疑问。林彪是不是一个冤案？林彪出逃是个谜，死更是一个谜。

对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审判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审判。因为江青所言，她的一切行为都是承毛泽东的旨意办的，如迫害刘少奇等。为了保住毛泽东之声名，所谓投鼠忌器，便使那最高的审理少了公正性说服力。国外一直称五人帮的原因。

中国一向以皇帝为正统，别人如反皇帝则为大逆不道，而不是以民为本来判断是非。我党则以毛泽东为正统来定罪，与毛泽东有分歧或者说反毛即反党。解放后定的反党集团，都应以民为本重新审视。

这些疑问怕只有到百年后才可能重新认识了。

今天要编我的文集之时，编入了几篇文化大革命时的出土物，引发出以上的思考。虽然过去了四十年，但仍旧不能说是不惑的思考，到了可以说话不会因言致罪的年代，故可以公开写出，以和大家讨论。

□ 2006年10月24日，参加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